

中国就业结构变化：“升级”还是“两极化”？

屈小博 程 杰*

内容提要 欧盟等发达国家经历典型的“就业两极化”，已成为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和重要挑战。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化是否切实反映了经济转型与发展阶段？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就业岗位分析方法（job approach）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整体就业结构变动呈现正在“升级（upgrading）”模式，区域层面就业结构呈现多样化和有序递进，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就业升级较快，中高或高收入岗位增长相对更多，符合中国发展阶段与产业升级的特征。但是，最近几年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的“两极化（polarization）”收入倾向已初露端倪，最低和中低收入岗位的就业增长率为负，尤其中低岗位大幅减少，中等收入岗位增幅较小，中高和最高收入岗位增长更多。未来就业两极化潜在风险也将成为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一大挑战，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公共政策调整与改革。

关键词 就业结构 就业升级 就业两极化 岗位分析法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改革，开启了中国两场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一是从一个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两场变革的结合产生了影响全球的“中国奇迹”：数十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过去

* 屈小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quxb@cass.org.cn；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chengjie@cass.org.cn。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YJ034、13CYJ017）、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课题“经济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研究”的资助。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研究员的评论和建议。

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速年均达到10%，2013年中国GDP总量（按汇率计算）已经接近6万亿美元，城镇人口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50%，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从70%以上降至约30%。历经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GDP从不足200美元提高到2010年约4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就业的显著增长与结构变化，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建筑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就业规模大幅度增长，就业结构变化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势必影响着就业结构变化：一是制度分割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近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在较长时期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但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分割体系阻碍了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数亿拥有农业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迁移人口深刻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发展。二是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资本、劳动力和政策等优势，依托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率先发展，经济与就业的地区不平衡正是其结果。三是“双轨制”的改革模式，在稳定原有优先行业国有企业的同时，逐步放开和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Lin, 2012），市场化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被惯称为“渐进式改革”，行政干预在经济和就业中的影响仍然较大。四是稳步融入全球经济（World Bank, 2013），以2001年加入WTO为里程碑，中国不断扩大和深化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一方面通过比较优势承接了制造业的国际分工，获取了国际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快速增长和出口的不断扩大，主要得益于基于相对比较优势的要素投入和资源配置效率，但原有经济发展动力正在丧失，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将转向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必然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整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正在丧失动力，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和贡献正在减弱（Zhu, 2012）。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要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劳动力市场必然也将顺应这一新的结构变化。2003年以来，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普通劳动者工资快速提高，劳动力市场出现用工短缺和工资趋同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终结，工资形成基础逐渐从生存水平转变为劳动边际生产力，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Cai & Wang, 2010）。这一变化让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受益，工资和收入持续上涨，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但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欧美发达

经济体的增长源泉几乎完全来自全要素生产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加剧劳动力市场分化和就业两极化特征（Goos & Salomons, 2009; Autor, 2010），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两极化倾向更加突出，在艰难的复苏之路中损失大量中等工资水平的岗位（Eurofound, 2013），中产阶级蒙受巨大打击甚至面临消失风险（Tuzemen & Willis, 2012）。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业结构的变化能否顺应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如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就业结构没有同步升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将会加大。从国际比较视角观察中国就业结构变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与就业转型之路，本研究采用岗位分析方法（job approach），利用中国人口普查和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从不同层次观察中国转型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特征。

二 文献综述

有关中国就业及结构转变的讨论，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3）最新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用很短时间快速地完成工业化过程，工业部门创造的 GDP 在 2006 年达到 42.2% 的高峰，之后便开始逐步下降，就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特征首先表现为非农业就业比重提高。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到 2010 年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已经减少到 2.8 亿，所占比重下降到 37%，若考虑到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不充分就业，按照工作月份折算成全职工作当量，农业部门实际就业人数将缩减 22%，农业就业比重已经下降到 30% 以下。Park et al.（2011）对农业就业劳动力的估算得出，目前农业部门创造的 GDP 只有 10%，这意味着农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农业就业规模和比重仍然有较大下降空间。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几近枯竭已是不争事实，30 岁以下年轻农村劳动力接近 90% 从事非农业活动，仍然从事农业的人口年龄偏大、人力资本水平偏低，通常不是城镇最需要的劳动力。

Cai et al.（2011）的研究指出，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城镇吸纳和集聚越来越多的就业。进入新世纪之后城镇化明显加速，2000 - 2010 年十年间城镇化率提高了约 1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约 2000 万人从农村流动到城镇，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达到 50%，7.6 亿就业人员中在城镇就业的比重也达到 46%。预计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在 2030 年达到 70% 以上，人口与劳动力向城镇集中的步伐不会停止。但是，受制于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迁移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制造业、建筑业

以及居民服务业等行业,尤其非正规就业特征明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2010年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2001年非正规就业比例高达87%,到2010年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60%。

关于中国就业变动的原因和机制, Li et al. (2012) 研究得出,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推动私营部门就业快速增长并成为主导部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劳动力退出国有部门,进入到私营部门,私营部门就业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995年的30%左右快速提高到2010年的约80%。Brandt & Zhu (2010) 估算显示,2007年非农部门就业比例已经达到74%,其中,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就业比例分别为62%和12%。Zhu (2012) 研究得出,贸易自由化推动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2007年制造业部门中仅国内私营企业就业比例已经超过50%。但是, Meng (2012) 根据2008年中国与印尼城乡人口迁移调查指出,政府部门以及非营利性组织的就业比例仍然高达36%,生产部门就业比例为64%,其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比例仍然占到25%,国内私营企业就业比例占31%。Yue et al. (2011) 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仍然受到行政干预,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有超过50%不能由职工自身可观察的特征来解释,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仍然发挥较大作用。

经济周期和波动对就业及其结构的影响方面, Cai & Wang (2010) 的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经济调整的冲击。Giles et al. (2012), 的估算得出,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冲击明显,造成较大的就业压力,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2000~3600万非农就业者失业或者暂时返回农村,失业者集中在进出口相关部门。Cai et al. (2010) 和 Wang & Cheng (2012) 的估算指出,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重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扶持,对于经济复苏和就业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2010年四万亿投资带动51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新增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钢铁、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行业,有较大部分岗位是短期性的,而且,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和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转变的典型文献, Cai et al. (2011) 全面梳理和分析了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呈现出的一些新特征。劳动力供求结构出现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殆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快速上涨,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发展壮大。不同技能水平、不同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态势,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尤为迅速,超过城镇平均工资水平增长速度,实际工资水平在

2001 - 2010 年间基本上翻了一番。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快于工资增长，从而避免了来自劳动力市场的通货膨胀压力。劳动力市场变化将带来就业结构的转变，中等工资收入的就业岗位有望更快增长。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更多地从经济部门、产业层次、所有制性质、城乡以及区域等视角观察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结构转变，国内有关就业两极化的实证研究不多。吕世斌和张世伟（2015）利用 1998 - 2009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就业“极化”现象，即相对于中等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有更大幅度的增加。本文则首次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从工资收入分布与工作岗位的角度分析了就业结构变化。本文下面的结构安排是：第三部分介绍岗位分析方法，欧盟国家就业结构的典型模式与特征；第四部分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2005 - 2010 年整体就业结构的变化及特征；第五部分采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和就业岗位分析法计算 2011 - 2013 年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及特征；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的讨论。

三 分析方法与就业结构模式

传统的就业结构分析往往分别观察行业分布变动或者职业分布变动，忽视了行业内部的职业差异，也忽视了职业内部的行业属性与特征，从而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就业特征信息。传统认识上的一些低端行业，也存在一些高端或高收入的职位，同样地，一般意义上的高端行业内部也存在一些普通的低技能职位。Eurofound（2008；2013）发展并推广了就业岗位分析测量方法（job approach），其计算公式及方法可以用式（1）、式（2）来表示。其中，“岗位”被定义为一个行业中的某一个职业，在行业与职业交叉确定的“岗位”基础上，根据工资水平（如平均工资或工资中位数）对这些“岗位”进行排序，再按照工资水平高低进行分组（如五等分组）^①，那么，工资水平最高 20% 的代表高收入（技能）“岗位”，最低 20% 的代表低收入（技能）“岗位”，具体可以划分为低收入岗位（low）、中低收入岗位（mid-low）、中等收入岗位（mid）、中高收入岗位（mid-high）以及高收入岗位（high），据此可以观察一定时期内“岗位”变动状况，分析就业结构变动模式和特征。

^① 虽然反映就业结构与质量的测量被认为是多维度的概念，然而许多研究者认同工资水平是反映与工作岗位和就业属性相关度最好的测量之一，如 Davoine et al.（2008）。

$$(S_1 \ S_2 \ \dots \ S_m) \begin{pmatrix} O_1 \\ O_2 \\ \dots \\ O_n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Job_{11} & Job_{12} & \dots & Job_{1n} \\ Job_{21} & Job_{22} & \dots & Job_{2n}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Job_{m1} & Job_{m2} & \dots & Job_{mn} \end{pmatrix} \quad (1)$$

$$\xrightarrow{\text{Rank_by_wage}} \begin{pmatrix} Job_{\max_wage} \\ \dots \\ Job_{i_wage} \\ \dots \\ Job_{\min_wage} \end{pmatrix} \xrightarrow{\text{Quantile}} \begin{pmatrix} High_{20\%} \\ Mid_high_{20\%} \\ Mid_{20\%} \\ Mid_low_{20\%} \\ Low_{20\%} \end{pmatrix} \quad (2)$$

这一分析方法将就业的研究对象关注于具体的就业岗位，与实际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每一细分行业（Sector₁, Sector₂, ..., Sector_m）、职业（Occupation₁, Occupation₂, ..., Occupation_n）的就业岗位对个体劳动者的就业及其工资收益有更准确和更深入的度量。这是因为同一个行业里不同职业的技能水平和人力资本要求有显著的差异，而相同职业在不同行业里的知识要求及工作经验又有很大差异。细分行业和职业的就业岗位差异，最终会体现在工资收入或工资差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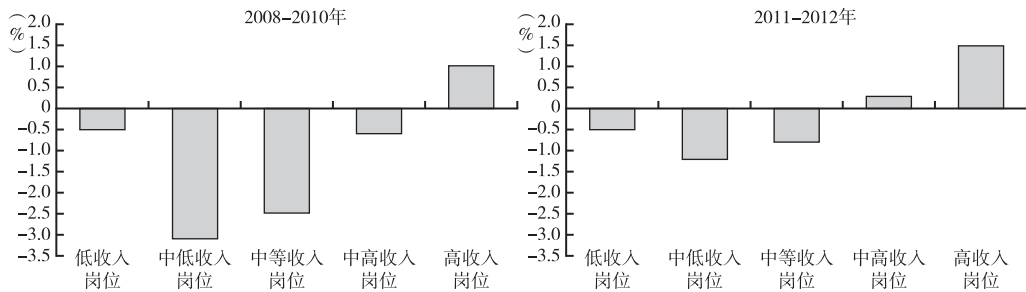


图1 欧盟的就业结构变动 (年增长率): 2008-2012年

资料来源: Eurofound (2013)。

利用这种分析方法, Eurofound (2013) 研究报告清晰地呈现出欧盟就业结构的两极化现象, 即中间收入岗位数量减少得更多, 就业呈现典型的“极化”特征, 而高收入岗位和低收入岗位数量增长更快或减少更少, 呈现出“中间低、两边高”, 尤其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尤为突出。由于相对比较优势的原因, 中等收入的岗位在技能水平较高与劳动密集型的较低岗位 (如制造业、建筑业的体力劳动者, 服务

业的直接服务消费者劳动密集型岗位)都不具有优势,因而遭受金融危机冲击需求减少,中等收入岗位的减少就更为明显,岗位损失更多,两极化倾向也更为严重(图1)。除了就业岗位的增长率,就业岗位分析方法也可以观察一定时期就业岗位数量的绝对变化,以更直观地呈现就业结构变动特征。例如(图2),欧盟国家1998-2007年间不同类型岗位变动存在明显差异,越高收入或技能岗位的增长规模越大,呈现出一个典型的“就业升级模式”,而2008-2010年间中间岗位明显减少,最低和最高收入岗位均有所增加,即备受关注的“就业两极化模式”。不仅欧盟国家如此,美国的就业结构也呈现较为典型的两极化特征。Autor et al. (2006)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就业岗位技能变化按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五等分、十等分考察,均显示出了就业两极化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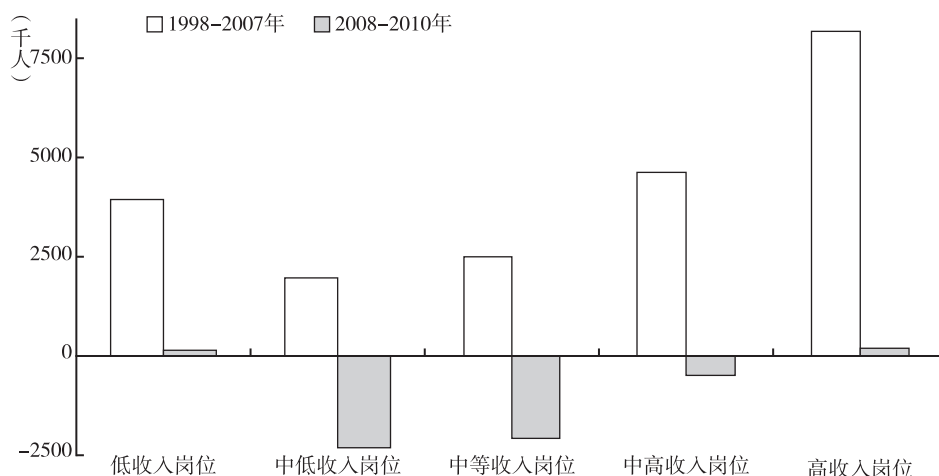


图2 欧盟的就业结构变动（数量）：1998-2010年

资料来源：Eurofound (2013)。

就业结构两极化研究较早地源自于一些有影响的研究 (Acemoglu & Autor, 2010; Autor et al., 2006; Goos et al., 2009)。这些研究讨论过去几十年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就业结构产生的一种较强的“极化”影响,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互联网(IT)革命在90年代所引致的技术创新与应用。这些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中等技能或中等工资结构的劳动力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而同时扩大了低端和高端技能(工资收入)的劳动力需求。Goos et al. (2009)的实证研究就发现,英国、美国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比较规则的两极化模式(如图2的模式)。实际上,就业结构模式除了从技术变化视角争论的两极化模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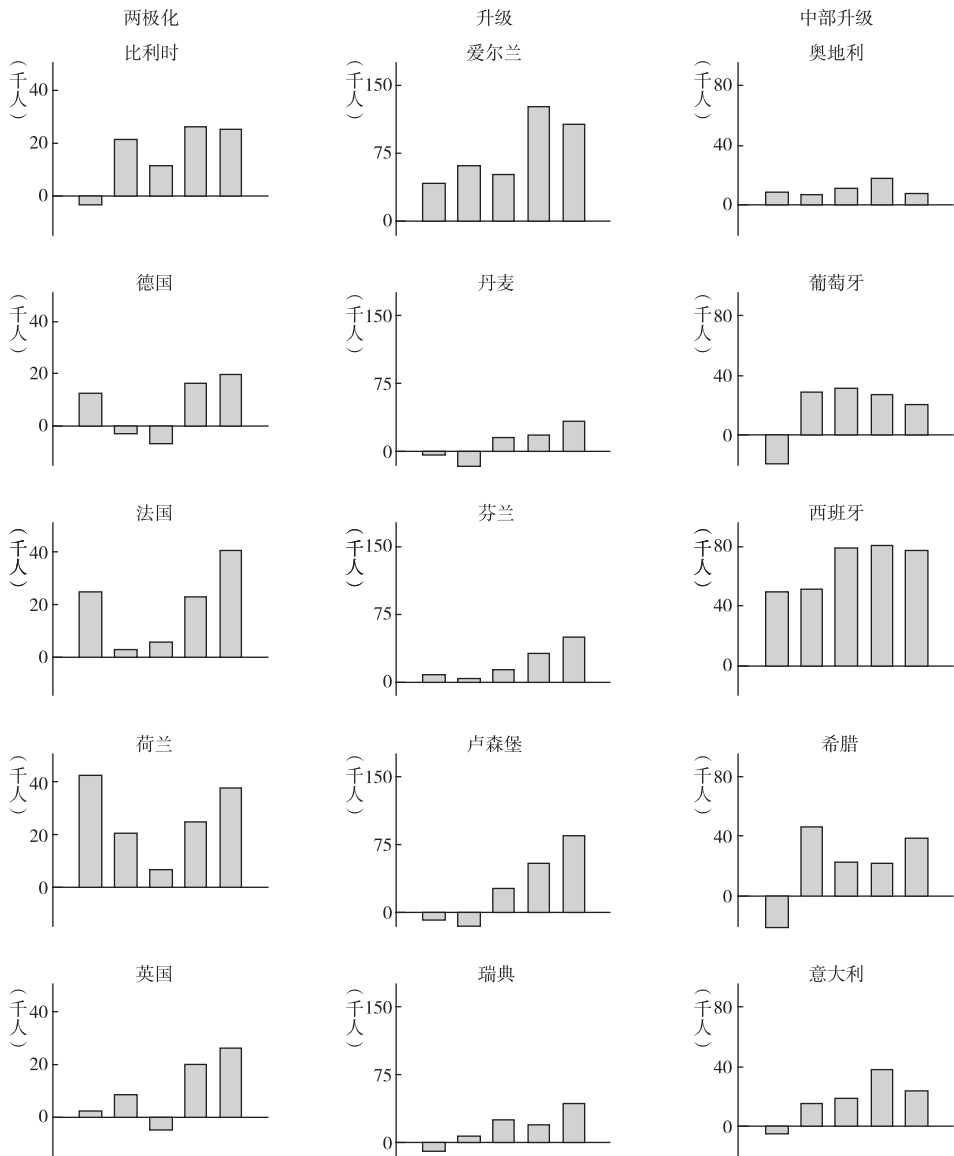


图3 1995-2007年欧盟国家按工资五等分的就业结构模式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欧盟劳动力调查（European Labor Force Survey），<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icrodata/european-union-labour-force-survey>。

Enrique (2012)、Eurofound (2013) 最新研究显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就业两极化模式并不是欧洲所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如图 3 所反映的，欧洲多数国家呈现出了 3 种主要的就业结构变化模式：两极化 (polarization)、正在升级 (upgrading)、中部升级 (mid-upgrading)。不仅如此，图 4 显示了金融危机冲击后东欧一些转型国家还出现了明显的就业结构降级模式 (downgrading)，即收入越低的岗位数量相对越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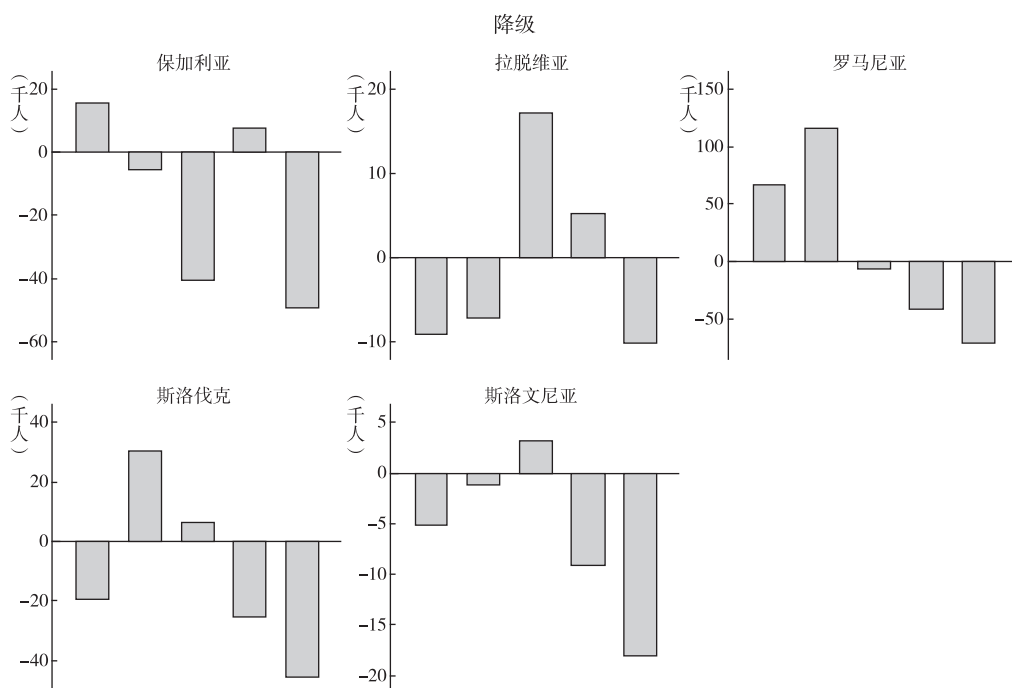


图 4 东欧部分国家 2011—2012 年按工资五等分的就业结构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Eurofound (2013)。

综合上述就业结构转变模式的国际经验和研究文献，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推断出几个特征性事实：第一，符合就业两极化模式的国家，其就业结构变动并不都呈现相同的程度。例如，荷兰是比较对称性的两极化模式，而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也呈现清晰的两极化结构，但“极化”的趋势更倾向最高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图 3 第一列），这种模式是与这些国家强烈的结构升级同时发生的。第二，除爱尔兰外，北欧一些国家（丹麦、芬兰、瑞典）呈现典型的就业不断升级的模式，而东欧一些转型国家的就业降

级模式则反映出就业岗位损失主要是高收入就业部分。第三，两极化（polarization）就业结构模式只是欧洲几种典型就业结构变动模式的一种。通常技术引致型就业两极化假设，中等收入或技能的岗位容易被机器替代，低端和高端收入岗位相对扩张并不是就业结构变化背后隐含的唯一或主导因素（Goos et al., 2009）。多数国家的发展经历中，其他因素也起了中和技术引致效应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比如劳动力市场规制制度对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Oesch & Jorge, 2011）。Eurofound（2013）也指出，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欧洲就业结构模式的多样化。

四 中国整体就业结构变化：人口普查的证据

我们尝试利用中国人口调查数据观察中国 2005 - 2010 年整体就业结构变化。使用岗位分析法需要有高质量的数据支持，2005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涉及 1000 多万人，包含就业、职业和工资收入等信息。我们利用随机抽取的 20% 子样本作为分析样本，样本数量为 2585481。2010 年开展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涉及全国所有人口，我们利用随机抽取的子样本作为分析样本，样本数量为 1267381。根据子样本计算结果，可以推算全国总体状况，加总指标根据样本权重进行调整。

中国的行业与职业分类标准与标准的国际部门与职业分类有所差异，按照二位码分类，中国的行业类别包括 99 种，职业类别也包括 99 种，从而形成一个 $99 * 99$ 的岗位分类矩阵，剔除掉一些数据中没有观测的“岗位”，中国实际存在 5480 个“岗位”。我们以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各个岗位的平均工资，按照工资水平进行排序和分类。由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没有调查工资收入的相应信息，我们假定这一期间不同“岗位”所对应的工资排序不变。

第一，就业岗位分析法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就业结构总体变动呈现出一个“就业正在升级”模式。这与丹麦、爱尔兰、芬兰、瑞典等国在 1995 - 2007 年的就业结构呈现相同的模式（图 3）。2005 - 2010 年间，最低收入岗位数量大幅减少 5000 多万，中低和中等收入岗位分别增长约 3000 万，中高和最高收入岗位分别增长约 2000 万（图 5 左）。大幅减少的低收入岗位主要来自于农业部门，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资收入更高的非农部门，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5 - 2010 年间农业就业规模减少 5500 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规模分别增加约 4000 万和 3000 万左右，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从 45% 下降到 37%。严格意义上的就业升级表现为更高收入岗位的数量增长越多或者增长越快，但对于正处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

家，中等收入岗位数量增长更多，我们可以理解为就业升级过程。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除了农业部门大量的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的最基本特征，非农部门的就业结构变化同样呈现出升级特征。2005 - 2010 年间，非农部门的最低收入岗位几乎没有增长，中低收入岗位增长最多，超过了 3000 万之多，中等收入岗位增长达到了 2500 万，最高收入岗位数量也增长了约 1500 万（图 5 右）。非农部门同样经历了一个就业升级过程，相对中高、高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数量增长更多，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和就业的质量仍在不断推进，这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动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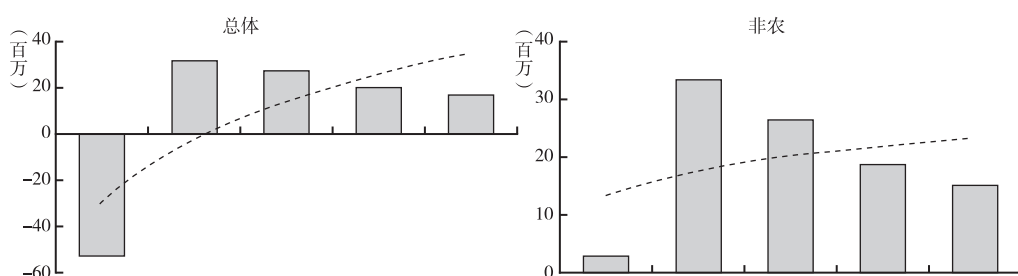


图 5 工资收入五等分组的总体就业与非农就业结构变化：2005 - 2010 年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第二，就业结构变动总体上呈现升级特征，但不同行业就业岗位变动特征存在一定差异。2005 - 2010 年间，制造业中最低收入岗位出现绝对减少，中低收入岗位增长超过 800 万，中等收入岗位增长最多，接近 1300 万，中高和高收入岗位数量也分别增长约 500 万，制造业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升级过程（图 6），这与现实中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趋势是一致的。建筑业的岗位增长集中在中等收入岗位，就业升级的质量相对较低。信息传输、软件和通讯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就业升级特征，较低收入岗位增长很少或者没有增长，中间收入岗位增长明显，高收入岗位增长更多。就业升级特征很大程度上与该行业的技术进步特征有关，信息技术代表了更先进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行业工资收入普遍处在较高位置。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的就业增长集中在中高收入岗位，而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就业增长集中在中低收入岗位，两者差异同样反映出行业的工资收入分布特征。公共管理行业的高收入岗位增长最为明显，卫生与社会保障行业的就业增长则主要集中在中高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数量出现减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就业两极化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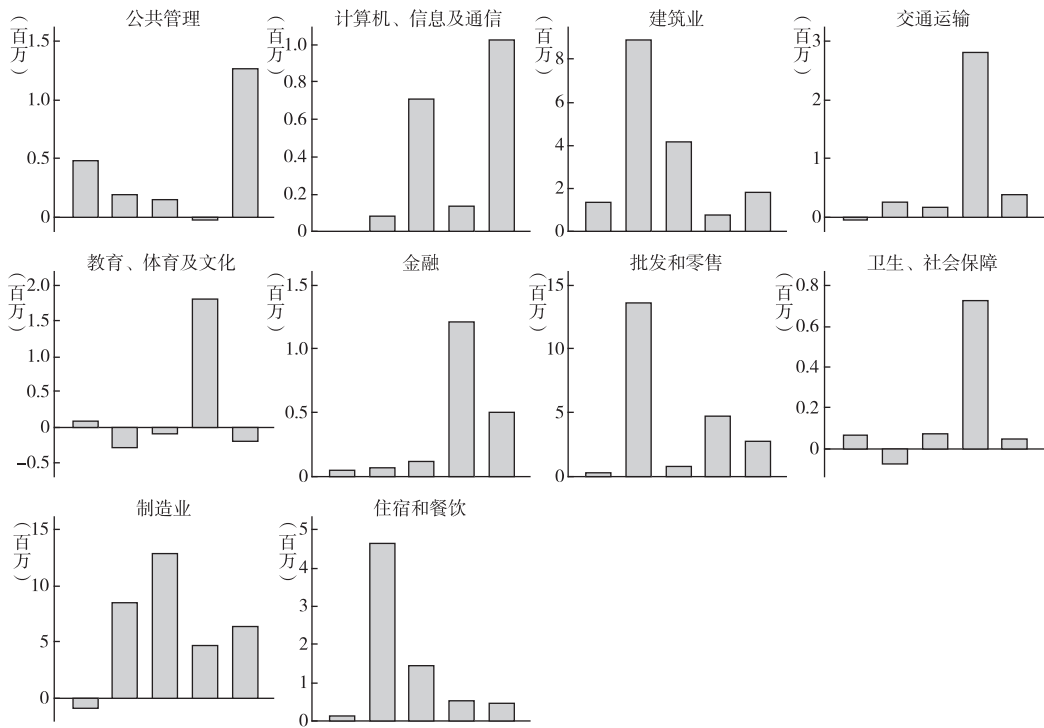


图6 2005-2010年主要行业按收入五等分的就业结构变化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第三，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很大，每个省份的就业规模不小于一个中等的欧盟成员国，我们采取同样的方法，观察不同地区（东中西部）和不同省份的就业结构变化，并比较分析不同地区和省份的差异特征（图7）。非农部门就业变动不同地区均表现出就业升级特征，中国显著的地区差异也显示出就业升级程度与升级结构的多样化（图8-图10），东部发达地区的就业升级质量相对更高。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都表现出就业升级特征，最低收入岗位的数量出现大幅减少或者增长很少，较高收入岗位的数量不同程度地增长。对比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岗位增长相对较多，以五等分组总体就业结构变化来看，2005-2010年东部地区高收入岗位增长了1000万，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仅增长2000-3000万，而且，东部地区高收入岗位增长还超过了中等或中高收入岗位，反映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就业升级处在不同阶段，东部地区就业升级步伐走在前面，就业升级质量更高，我们将其描述为“有序递进的升级（sequential upgra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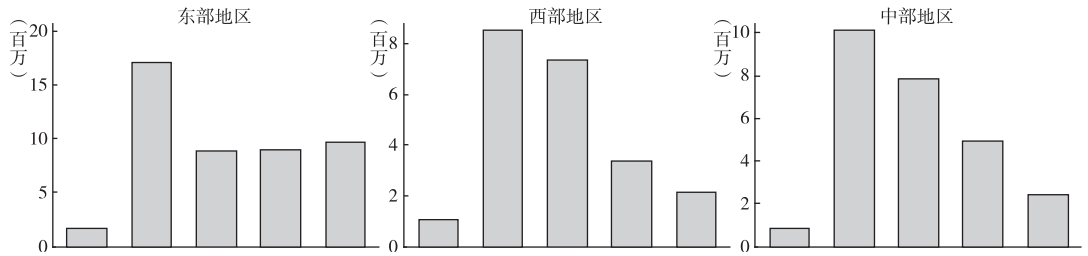


图 7 2005-2010 年东、中、西部按收入五等分的非农就业结构变化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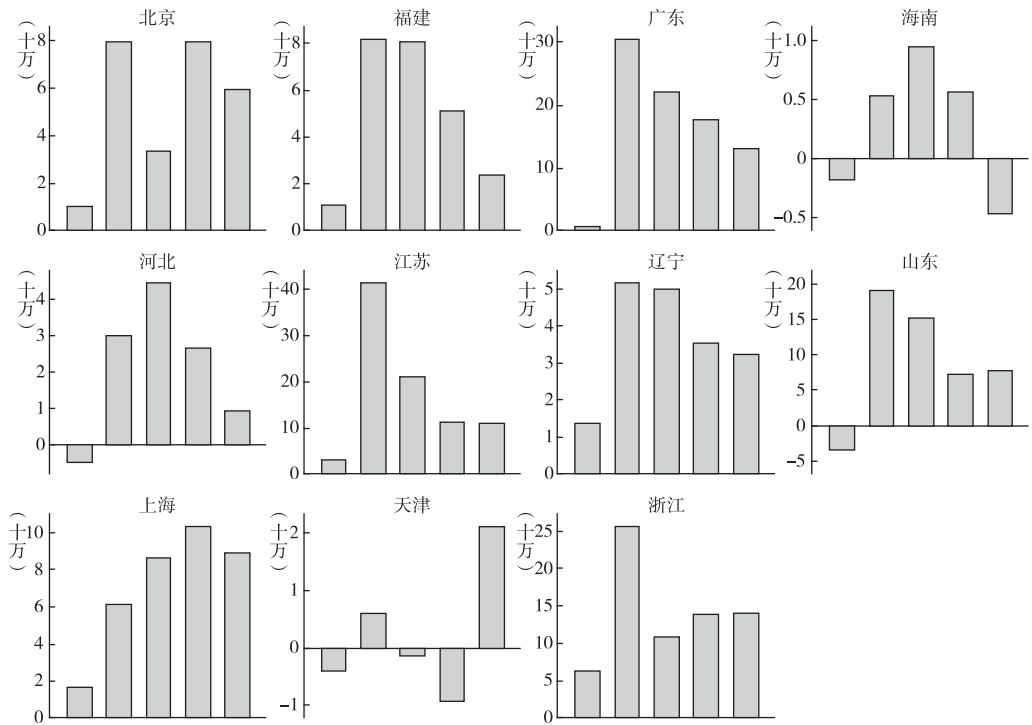


图 8 2005-2010 年东部省份按收入五等分非农就业结构变化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根据 2005 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从总体就业结构来看，绝大多数省份都正在经历一个就业升级过程，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动人口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以农业就业为主的最低收入岗位数量大幅减少，其他更高收入的岗位数量明显增加。但是，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资源禀赋与经济结构不同，各省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就业结构变动特征也存在差异。尤其，随着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一体化程度增强，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加快，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流向东部省份，区域之间的就业结构变化既存在差异，也存在某种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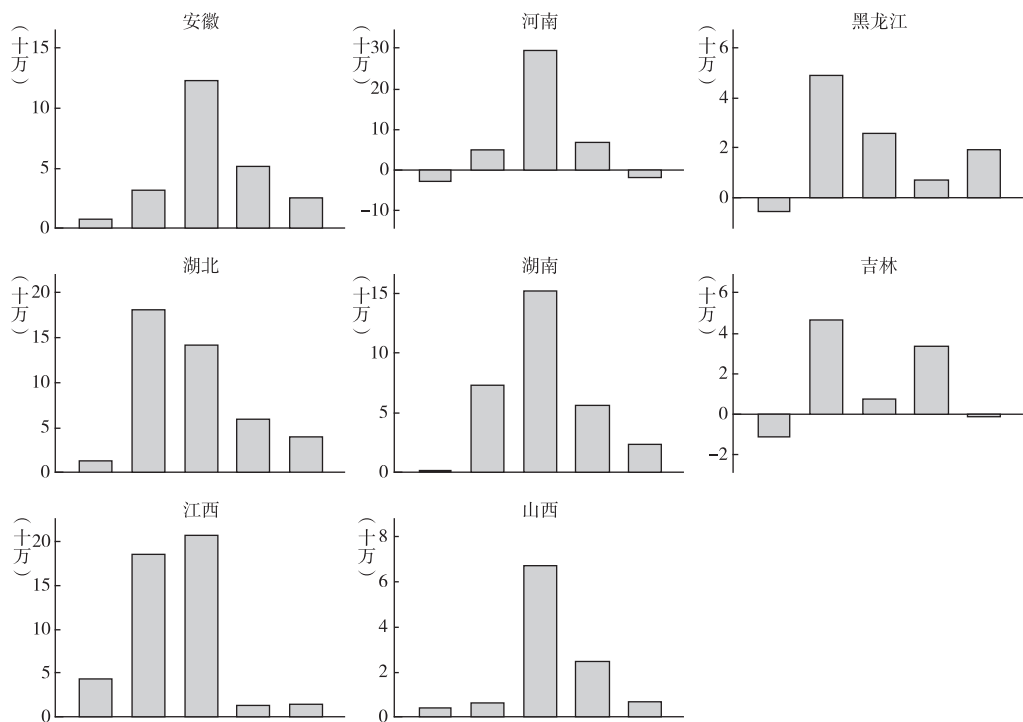


图9 2005-2010年中部分省份按收入五等分非农就业结构变化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通过就业岗位分析非农就业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特征：第一，大多数省份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中低或中等收入岗位增长更多，低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增长较少或者出现减少，如东部地区的河北、江苏，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西部地区的广西、云南等省份，均呈现出就业正在升级的特征。第二，产业升级过程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层次差异，高收入岗位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而中西部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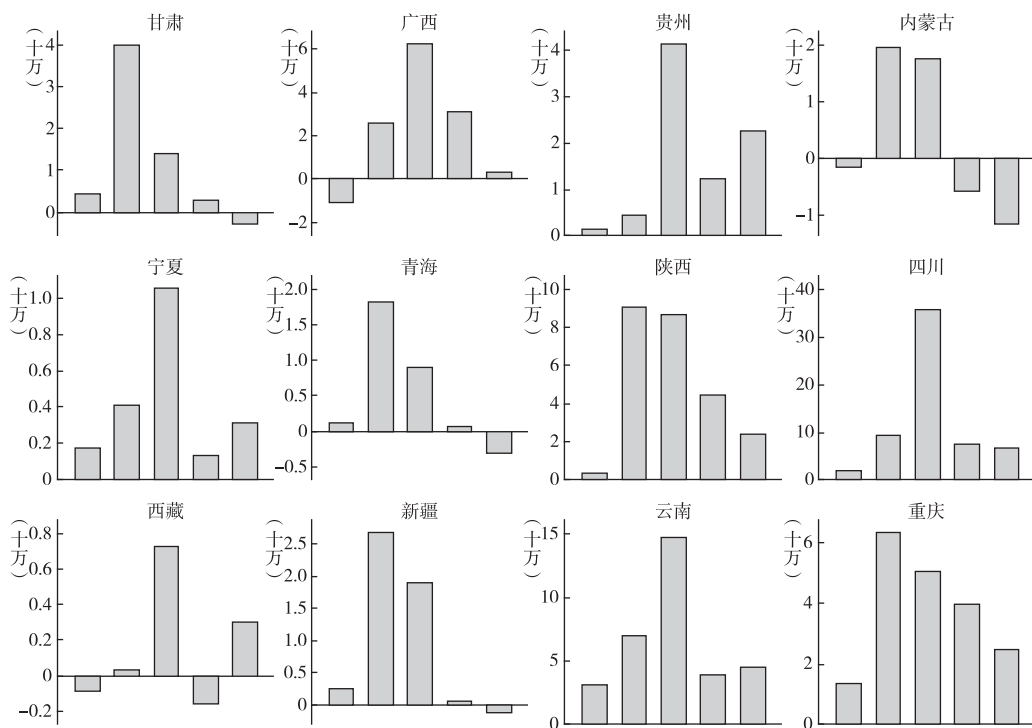


图 10 2005 - 2010 年西部省份按收入五等分非农就业结构变化

注：横轴上的五个柱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低收入岗位”、“中低收入岗位”、“中等收入岗位”、“中高收入岗位”和“高收入岗位”。

资料来源：根据 2015 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的高收入岗位增长很少，甚至出现绝对减少。经济发达省份的产业升级质量相对更高，尤其在经济、政治方面具有重要位置的几个省级城市，例如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的北京、上海和天津，就业结构变化呈现出更为标准的就业升级模式。第三，资源要素流出的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产业结构变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级倾向，例如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和青海等，尽管中等收入岗位在增加，但中高或高收入岗位出现明显减少，这些省份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等）和劳动力输出支撑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可持续性挑战，高素质人才和高收入岗位倾向于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岗位。

五 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升级 VS 两极化？

农民工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最活跃的劳动群体，其就业结构呈现什么特征？尤

其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如表1)^①。按照收入分组的就业岗位分布反映出了农民工就业结构呈现何种特征?由于全国有代表性的能反映农民工收入与就业特征的微观数据非常有限,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微观数据尚未公开,官方仅公布了整体就业的行业和职业分布,无法深入观察农民工随收入变化的就业结构变动模式和特征。另一个全国有代表性的微观数据就是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②,尽管其样本来自于在城市较为稳定居住的流动人口家庭,但其覆盖了31个省份,调查样本量大。因此,我们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数据,一方面反映农民工就业结构转变和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的特征,观察就业结构转变是否导致了农民工就业两极化或职业分化现象,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不同就业岗位分布的变化特征,以反映经济需求的就业结构变化。另一方面,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民工就业总量不仅大幅增加,而且农民工工资上涨更为快速,我们利用这一数据反映2010年人口普查后农民工就业结构趋势与特征。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数据,行业分类有15种,职业有8种。这样,农民工细分行业和职业的就业岗位种类共有120种。这120种就业岗位的分布和数量变化不仅能更好地体现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而且能深入反映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与就业的结果及其就业质量。

表1 农民工平均工资增长变动情况

单位:元

年份	总体	跨省流动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样本量
2010	2215.7	2271.2	2064.9	2026.1	187830
2011	2378.2	2378.4	2110.1	1993.4	48596
2012	2905.4	3036.0	2676.9	2592.1	110922
2013	3248.6	3291.0	2883.2	2703.7	143141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经过加权处理。

我们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数据,对上述农民工的120种细分就业岗位分布和规模按工资收入等级进行了计算和度量。这样计算和处理的结果一方面能

① 2008年国家统计局建立农民工监测抽样调查以来,2008-2012年,农民工名义月工资从1340元增长到2290元,年均增长率为17.7%。

② 关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介绍、样本量及抽样等情况,请参见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管理系统官方网站:<http://www.ldrk.net.cn/front/chnl.html?chnlId=61>。

比较深入细致地反映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可以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源泉和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岗位分布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同时，这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直接的微观证据。

根据第二部分的论述，岗位分析的途径是利用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数据反映经济需求层面的结果，即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和判断未来企业和用人单位将会提供什么特征的岗位，哪些岗位会增加，哪些岗位会减少。为此，我们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2011 - 2013 年数据中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由低到高排序，按照分位数将工资收入五等分，分别是“低工资收入 (low)、中低工资收入 (mid-low)、中等工资收入 (mid)、中高工资收入 (mid-high)、高工资收入 (high)”，这样分别对应上述度量就业结构变化和就业质量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分布。

图 11、图 12 和图 13 分别是 2011 - 2012 年、2011 - 2013 年、2012 - 2013 年按照上述方法计算的工资收入分组与就业岗位增长率分布图，其中，图中横轴代表农民工工资由低到高排序后五等分的工资收入组，纵轴代表细分行业和职业交叉的就业岗位数量增长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以 2010 年的数据为基点分析就业岗位分布的变化，主要是因为 2010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分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调查的规模远高于 2011 - 2013 年，考虑到样本规模的代表性以及工资测量时间，我们只选取了 2011 - 2013 年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分组与就业岗位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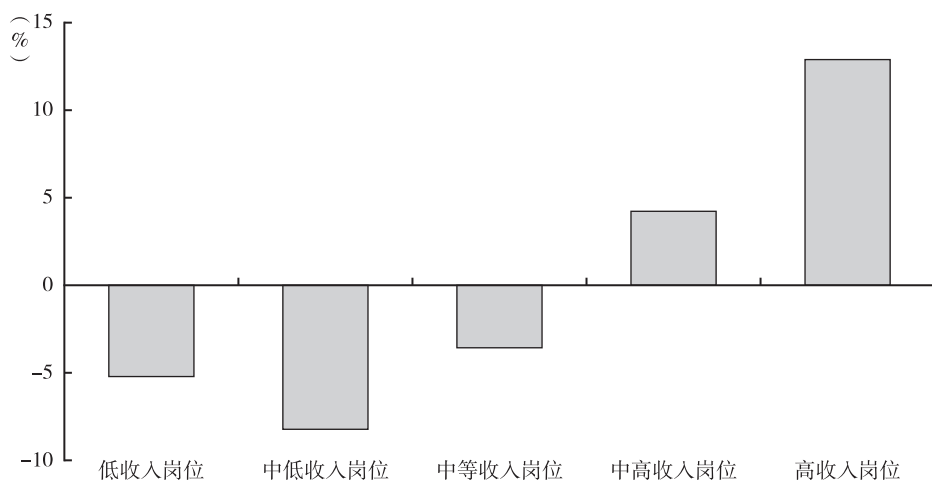


图 11 2011 - 2012 年按工资五等分的农民工就业岗位数量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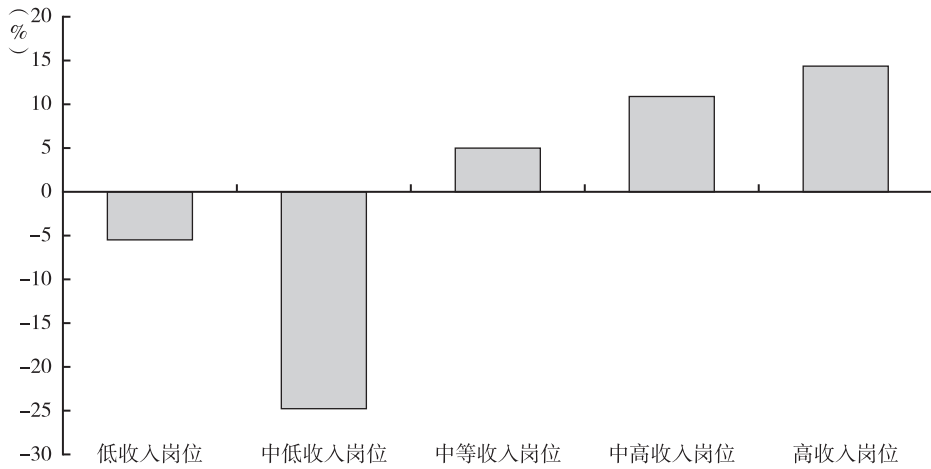


图 12 2011 - 2013 年按工资五等分的农民工就业岗位数量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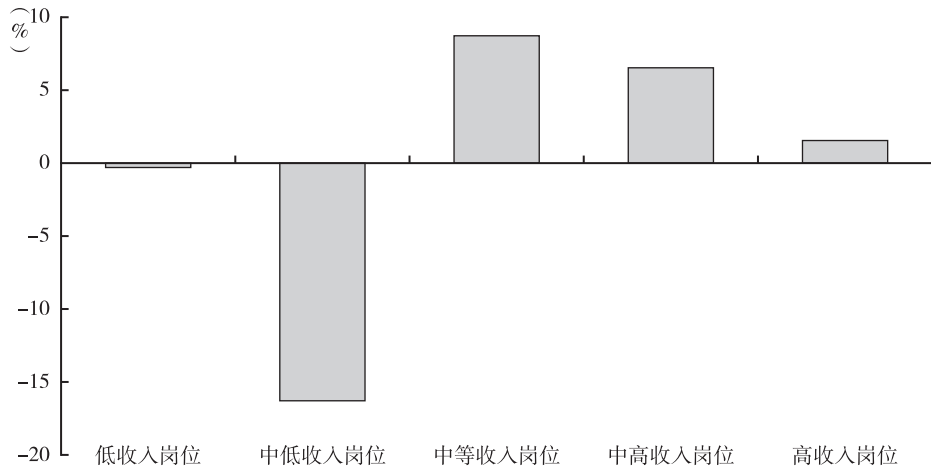


图 13 2012 - 2013 年按工资五等分的农民工就业岗位数量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第一，从图中可以看出，2011 - 2012 年低工资收入组、中低工资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增长率为负，表明这些就业岗位的绝对量在减少，并且中等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增长率虽然为负，但增长率小于低工资收入组、中低工资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增长率，即中等收入组的就业岗位数量减少少于低工资收入组和中低工资收入组。最明显的特征是，中高工资收入组和高工资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增长率为正，并且有明显数量和规模增长。

整体来看，从2011-2012年，低工资收入组的农民工就业岗位数量减少小于中低工资收入组和中等工资收入组的农民工就业岗位数量，而且中高工资收入组和高工资收入组的就业岗位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增加。整体上，农民工就业结构“两极化”的特征已经初露端倪，出现类似于欧盟整体就业结构变动的模式。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吕世斌和张世伟（2015）发现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极化”现象是相似的^①。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上述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动测量结果的分布判断为两极化的初步倾向，是因为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样本主要反映的是在城市稳定居住的农民工群体，是农民工群体中收入和就业相对稳定的样本代表，没有覆盖流动性比较强、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另一方面，动态监测数据对行业和职业的分类与人口普查的细分类别还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将这一结果的就业结构变化定义为“两极化”特征的初露端倪。

第二，2011-2013年的“工资收入分组与就业岗位增长率”分布图也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并且2012-2013年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除了高工资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增加低于中等工资收入的就业岗位和中高收入组的就业岗位外，在低工资收入组和中低工资收入组则与2011-2012年、2011-2013年呈现相同的就业岗位增长率变化。不仅如此，从“工资收入分组与就业岗位增长率”分布的趋势线可以看出，农民工就业结构呈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就业升级”。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就业结构“中部塌陷”相似的两极化特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加快，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工资决定的主要因素，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地升级，即生产效率高的高收入、高技能就业岗位数量会不断增加。未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会缩减，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会提高。目前，服务业行业内部农民工就业结构中，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远高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就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中国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过程经济结构比重最大的服务业行业中将会产生大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岗位需求。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是将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型服务业相互交叉连接的新型服务业岗位，对人力资本和知识的需要会大幅增加。

第三，图14和图15反映了农民工从业比重最高的行业——制造业、建筑业行业的“工资收入分组与就业岗位增长率”分布图，整体上也呈现出与农民工总体就业结构相似的特征，即中低收入岗位和中等收入岗位的数量减少幅度相对更大。同时，由于农民工整体的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比重达到了35%左右。

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低，因此在制造业高收入组的就业比重较小，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的变化。可能原因是，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行业和职业信息只包括行业大类和职业大类，难以反映制造业内部更细分的行业种类的就业岗位变动。更细更深入的就业岗位分类更有助于反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就业岗位分布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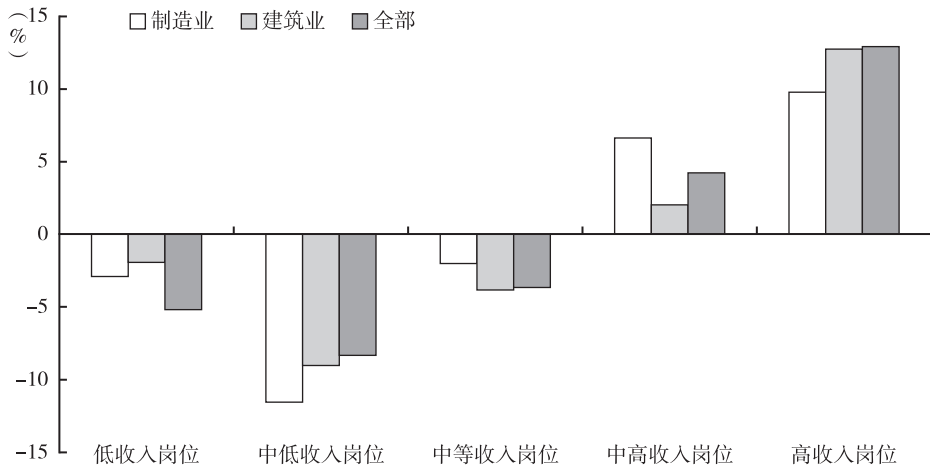


图 14 2011 - 2012 年按工资五分分的制造业、建筑业及全部行业的就业岗位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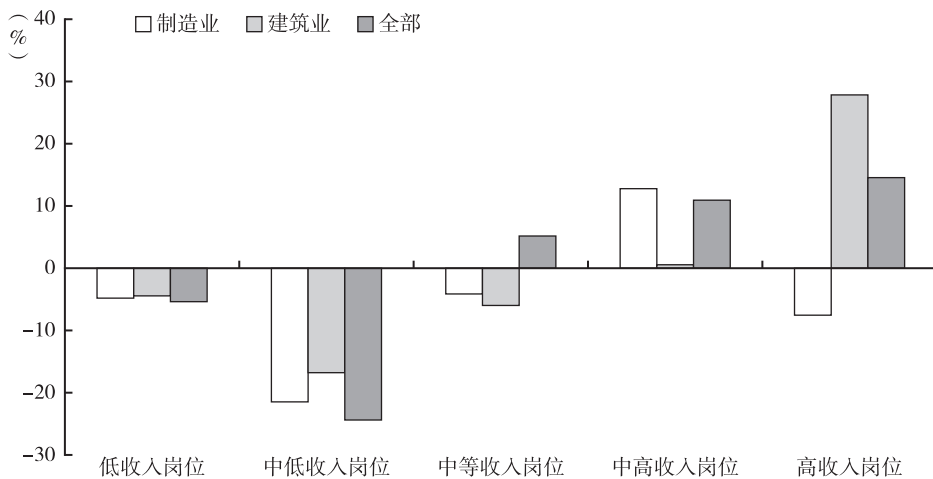


图 15 2011 - 2013 年按工资五分分的制造业、建筑业及全部行业的就业岗位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综上所述，我们将农民工就业岗位分布与农民工内部就业结构转变总结为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一是如果以工资收入等级来代表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的话，农民工不同工资收入等级的就业岗位分布和数量增减实际上反映了就业需求结构的转变，即低收入、低技能的就业岗位和高工资、高技能的就业岗位数量要高于中等工资收入、中等技能的就业岗位。这主要源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相对比较优势的变化，即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中等工资收入、中等技能水平的就业岗位没有相对比较优势和价格弹性，在农民工工资普遍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最容易被“机器”所替代。

二是随着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和产业不断升级，近年来农民工就业结构整体上呈现“就业两极化”和“就业升级”相互并存的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传统增长模式向生产效率驱动的模式转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因此，不可能只呈现一种就业结构态势，就业结构转变还处在变化之中，要素投入相对价格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都会对就业岗位需求产生显著影响。

三是尽管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缺乏更详细的行业种类和职业种类的信息，就业岗位测量只有 120 种^①，但是我们知道，产业升级不仅是制造业、建筑业的比重缩减，服务业的比重提高，更重要的是产业内部的转移升级，如传统制造业的削减、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创造。反映在就业上就是行业内部的升级和行业间的就业转移，从生产率低的行业向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比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通讯计算机制造业等产业有更为细分的行业，从资本劳动比上这些产业也归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些行业间的就业转移则更为普遍，表现为劳动力就业会不断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行业，而这种行业间的转移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工资收入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就是工资收入的显著提高，并且这些制造业行业未来具有明显的岗位技能不断深化特征，即需要技能和知识综合型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行业大类和职业大类反映的就业岗位变化难以反映行业内部升级和细分行业间就业转移的结构变化。

^① 人口普查数据中有更为详细的行业中类和职业中类信息，按照本研究的行业 and 职业交叉产生的就业岗位在 5400 多种左右，这样更细分的就业岗位度量既可以体现就业行业的内部升级，也可以体现行业间的就业转移，从生产率低的行业向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

六 结论与讨论

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四种就业结构模式：两极化（polarization）、正在升级（upgrading）、中部升级（mid-upgrading）和降级（downgrading）。本文使用中国有代表性的数据，从国际视角观察中国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中的就业特征，发现中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上述四种结构模式。这说明作为经济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阶段，中国就业结构变化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性规律。根据2005-2010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动总体上呈现出升级特征，最低收入岗位数量大幅减少或增长很少，较高收入岗位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尤其是中低或中等收入岗位的增长更多，这主要归因于大量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收入水平更高的非农部门，我们将其描述为“就业正在升级模式”，即类似于欧盟部分国家的“正在升级”（upgrading）就业结构模式。

中国是地区差异显著的人口大国，不同区域和省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不平衡主要归因于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结构变化也表现出层次差异特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省份的就业升级步伐走在前面，中高或高收入岗位增长相对更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省份的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中低或中等收入岗位，产业升级层次相对较低，甚至有些省份还出现就业退化或降级的迹象，这与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具有类似特征（Cai et al., 2009），我们将其描述为“有序递进的就业升级模式”。

中国在加快融入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国际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尤其中低收入劳动者和制造业部门受益广泛，全球化对于以中低收入岗位增长为主的就业升级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地，世界经济调整和波动不可避免地对产生影响，2008-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了短暂的就业冲击，但很快得以恢复，整体就业并未出现类似于西班牙、希腊、英国等国家的就业两极化现象（Eurofound, 2013）。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消失的中等收入岗位究竟去哪里了？是否有可能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流入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全球视角去探讨就业结构变化，也许可以找到更好的答案。

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的增长方式将加快转变，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增长的传统模式将不可为继，未来增长将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

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也将顺应这一结构转变，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岗位，尤其当一个经济体在技术阶梯上处于上升期时，对各种教育和技能水平的需求都会明显增加（World Bank, 2014）。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更高技能劳动者需求会继续增长，更高收入的岗位也有望加快增长。但是，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2011 - 2013 年的数据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稳定居住和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就业两极化”倾向已初露端倪，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对教育的负面效应导致大量低技能青年农民工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农民工的工作岗位更容易被新技术、新管理组织生产方式所替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教育两极化现象已经显现，这些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农民工，未来难以适应产业升级需要，只能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工人也将面临技术进步的冲击，工作岗位更容易被新技术、新设备替代，不能形成劳动力供给与就业岗位同步升级。因此，未来中国就业结构可能出现“就业两极化”的潜在风险，这必然将加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这将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挑战。由于存在扭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信号也不可避免遭到扭曲，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未必能够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一致。因此，清除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公共政策改革和调整，比如通过以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进一步扩大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而且也是矫正劳动力市场信号扭曲，让工资上涨得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互适应的途径。

参考文献：

- 吕世斌、张世伟（2015），《中国劳动力“极化”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2 期，第 757 - 778 页。
- Acemoglu, Daron & David Autor (2010).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082.
- Autor, David (2010). The Polarization of Job Opportunitie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The Hamilton Project and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shington D. C. .
- Autor, David, Lawrence Katz & Melissa Kearney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 S. Labour

- Marke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86.
- Brandt, Loren & Xiaodong Zhu (2010).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764, February.
- Cai, Fang & Meiyang Wang (2010).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 Transitio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1), 71 – 81.
- Cai, Fang & Dewen Wang (2010). Employment Should Top Crisis Agenda. *China Economist*, 5(1), 29 – 35.
- Cai, Fang, Dewen Wang & Huachu Zhang (2010). Employment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8(1), 33 – 46.
- Cai, Fang, Dewen Wang & Yue Qu (2009). Flying Geese within Borders: How Does China Sustain Its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Wing Thyee Woo(ed.),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 Cai, Fang, Yang Du & Meiyang Wang (2011).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Protection Mechanism. Background paper for China 2030,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Davoine, Lucie, Christine Erhel & Mathilde Guergoat-Lariviere (2008). Monitoring Quality in Work: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dicators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7(2 – 3), 163 – 198.
- Enrique, Fernández-Macías (2012). Job Polarization in Europe?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Job Quality, 1995 – 2007. *Work and Occupations*, 39(2), 157 – 182.
- Eurofound (2008). More and Better Jobs: Patterns of Employment Expansion in European. ERM Report 2008,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 Eurofound (2011). Shifts in the Job Structure in European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 Eurofound (2013).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and Job Quality during the Crisis: European Jobs Monitor 2013*. Eurofound, Dublin.
- Giles, John, Albert Park & Fang Cai (2012). Weathering a Storm Survey-Based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in Chin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PS 5984.
- Goos, Maarten, Alan Manning & Anna Salomons (2009).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abor Market. *Economic Review*, 99(2), 58 – 63.

- Goos, Maarten, Alan Manning & Anna Salomons (2010).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in Europe: The Roles of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CEP Working Paper*, No. 1026.
- Li, Hongbin, Lei Li, Binzhen Wu & Yanyan Xiong (2012).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57 – 74.
- Lin, Justin Yifu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 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ng, Xin (2012).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75 – 102.
- Oesch, Daniel & Jorge Rodriguez Menes (2011). Upgrading or Polarization? Occupational Change in Britain, Germany, Spain and Switzerland, 1990 – 2008. *Socio-Economic Review*, 9, 503 – 532.
- Park, Albert, John Giles, Fang Cai & Yang Du (2011). Labor Scarcity, Labor Regulation, and Prospects for China’s Labor Markets. The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US-Chin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February 25 – 26.
- Tuzemen, Didem & Jonathan Willis (2012). The Vanishing Middle: Job Polarization and Workers’ Response to the Decline in Middle-Skill Job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First Quarter.
- Wang, Dewen & Jie Cheng (2012). Public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Fang Cai (ed.),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 Volume 3. Brill, February, 2012.
- World Bank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4).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 Yue, Ximing, Shi Li & Terry Sicular (2011). High Incomes in Monopoly Industries: A Discuss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2 (2), 178 – 196.
- Zhu, Xiaodong, (2012).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103 – 124.

Changes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China: Upgrading or Polarization?

Qu Xiaobo & Cheng Ji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re experiencing a classical “job polariza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llenge and character of labor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China’s employment structures truly reflecte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phase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and census in 2005 and 2010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dynamic survey on migrat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ange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s using the job approach. We find that China’s employment structure features is an “upgrading pattern”, which means the number of the low-paid jobs falls sharply or increases mildly while that of higher-paid jobs increases in various degrees, especially the number of mid-low-paid and mid-paid jobs grows largely. We also find a sequential upgrading in employment changes in layer of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means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have led the upgrading process, with a relatively bigger increase in mid-high-paid and high-paid jobs than other regions, which accord with features of China’s developing stag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Rural migrants appear job polarization tendency, with a relatively bigger increase in mid-high-paid and high-paid jobs than mid-low-paid jobs and mid-paid jobs. Therefore, potential risk of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will become a big challenge in China’s mid-income stage, which needs more active reform and adjustment of public policy.

Keywords: employment structure, job upgrading, job polarization, job approach

JEL Classification: E24, J21, J30

(责任编辑: 周晓光)